

# 青春的光亮

■何建明

## 回望初心

幸福之根,复兴之源

当我一次次走进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总会被墙壁上那一张张稚嫩而青春的脸庞所感动,耳畔也会情不自禁地响起那句令人荡气回肠的话:“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近代以来,我国青年不懈追求的美好梦想,始终与振兴中华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联。在革命战争年代,广大青年满怀革命理想,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冲锋陷阵,抛洒热血……”

是的,是梦想和朝气让一代又一代青年为了理想和信仰冲锋陷阵、抛洒热血。在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时代,年轻的革命者怀揣理想来到大上海,来到党的身边,来到当时的革命中心。为了投奔革命,他们中许多人放弃了家庭和舒适的生活,离开了亲人和故乡,是党的召唤和熊熊的革命战火,让他们感到心是热的,青春是充满激情的。

在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内,有两位年轻的烈士深深烙在我心头,第一位是在南京雨花台牺牲的烈士金佛庄。1918年,21岁的金佛庄考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成为军官候补生。4年后,金佛庄在浙军部队当连副,加入了共青团。也就是那一年,他路经上海,接受了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徐梅坤的考察,后来报组织批准,正式转为中共党员,成为当时浙江省内第一个党小组——杭州小组的三名党员之一。

1923年,金佛庄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金佛庄继续保持军人身份,以便他掌握的军事实力今后可为革命所用。

1924年春,金佛庄第一次以中共党员身份秘密到达上海,向中共上海区委报告杭州的革命形势。之后国共合作进入“蜜月期”,金佛庄受组织指令,到广州参加黄埔军校创建工作,成为第一期第三学生队队长。此间,他受到国民党左派领袖、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的器重,升任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五名执行委员之一。同时,金佛庄受中共组织指令,积极发展学员中的积极分子加入中共组织。在两次“东征”中,金佛庄出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2团党代表和团长。“中山舰事件”后,金佛庄回到军校当军事教官,蒋介石对金佛庄十分器重,借“老乡关系”拉拢他,暗示要他脱离中共,将予以重任。金佛庄经请示组织,名义上到蒋介石身边担任总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兼第三科科长之职,实为暗中监视蒋介石。

1926年7月起,北伐军迅速向江浙

和上海一带进军,并捷报频传,威慑孙传芳旧军阀部队。11月底,北伐军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研究进攻上海和江浙一带孙传芳部队的计划,拟派熟悉江浙和上海一带情况的金佛庄潜伏到上海,对孙部队进行策反工作。

12月9日晚,带着特殊使命的金佛庄乔装成回上海的商人,从江西九江登上英国商船太古号,顺水东下。一路上,金佛庄心潮起伏,因为他在蒋介石身边,深知此时的蒋介石已经起了野心,正在借北伐军之威,寻找机会发动反革命政变。金佛庄就是想趁这一趟东下上海,将自己所知的重要情报,向在上海的中共组织报告。哪知,在11日船至南京下关码头时,金佛庄被孙传芳的南京宪兵司令汪其昌等“请”上了岸。

12日和13日,中共上海组织的同志没有等到应该在这两天中到达的金佛庄,于是与沿途码头联系询问金佛庄的下落。很快,南京方面有了消息:12日晚,孙传芳已经命令他的南京宪兵司令汪其昌将金佛庄杀害于雨花台……

金佛庄因此成为第一位被杀害于雨花台的中共党员。那年他29岁。当我站在他穿着北伐军戎装的照片前,深深地被那张意气风发的青春面庞所感染。我在想:倘若他那一顺利到达上海,重新投入党的怀抱,之后他是否会成为我军的一名将领,或者是成为共和国的勋勋呢?

与金佛庄一样,另一位贵州籍的小烈士袁咨桐也一直烙在我的脑海之中。之所以称其为“小烈士”,是因为他牺牲时年龄仅有16岁。因为当时没有达到18岁的“法定年龄”,后来敌人使了个邪招,在“死刑判决书”上把他的年龄由“16”改成了“18”……

袁咨桐的老家在贵州习水,他是历史上著名的“晓庄青春十烈士惨案”的牺牲者之一。所谓“晓庄”,是当年教育家陶行知在南京郊区开设的中国第一所试验型乡村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其实是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一所设在敌人心脏区域的“青年红色革命摇篮”。时任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之一的陈云同志曾经说过,晓庄是革命的火种。

袁咨桐之所以到与自己家乡远隔千里的地方学习,是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两个哥哥都在外面做官,其中一个还在国民党军队里当不小的官。袁咨桐10岁那年,因其舅舅张华封和近代著名教育家黄齐生私交甚深,所以被家人送到贵阳黄齐生所办的达顺学校上学。黄齐生是王若飞的舅舅,思想进步,教育有方,在当地影响力极大。不幸,其子生病夭折,于是聪明伶俐的袁咨桐被黄先生视为义子,格外疼爱和关照。因为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

黄齐生多次带领学生闹学潮,后被解职。黄齐生为逃脱反动政府的追杀,前往上海。13岁的袁咨桐不顾家人反对,跟随黄齐生到了黄浦江畔。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此他与中共领导人王若飞相识,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1929年,按照中共江苏省委指示,“争取在敌人心脏地带建立党的组织,积极开展革命活动”,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便成了主要革命基地。当兼任江苏省委负责人的王若飞向袁咨桐“愿不愿意到晓庄边读书边革命”时,袁咨桐欣然表示“特别渴望”。

在王若飞的安排下,这位15岁的贵州习水少年便离开上海,到了南京市郊的晓庄学校,开始了边读书边从事革命工作的经历。在那里,他很快加入了共青团,并在不久后出任了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小小年纪的袁咨桐对革命工作非常投入,去南京大街上秘密发传单,到工厂农村进行革命宣传,他事走在前头,深得陶行知的赞赏。

然而南京毕竟是国民党的老巢,晓庄学校袁咨桐等共产党人和青年团员的革命活动,很快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并引起蒋介石的直接关注,于是国民党南京政府下令停办晓庄学校。

陶行知得知后,立即组织师生进行抗争,并有学生团体上南京游行抗议。这更激起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灭晓庄”之心,并且借机欲“彻底捣毁共党窝点”,派出大批特务追杀晓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者。在袁咨桐第一次被捕后,其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官员的哥哥,亲自出面保释了他。哥哥生气地对袁咨桐说:“你再去参加共党活动,枪毙你我也不管了!”

袁咨桐并没有听从哥哥的话,继续从事紧张的地下革命工作,并时常受组织委托到上海向王若飞汇报“南京形势”和工作情况,奔波于沪宁两地。

“现在形势非常紧张,陶先生也躲避到了上海,要不你暂时也留在我身边吧!”王若飞非常关心袁咨桐的安全,对他说。

“正因为陶先生不在,那边学校里的党员和团员更危险了,至少要等我安排好他们后,才可以放心回上海……”袁咨桐真诚而急切地说。

“也好。速去速回吧!”

就这样,袁咨桐重新踏上了充满危险的“北上”之路。此时的南京,山雨欲来风满楼,尤其是晓庄学校被捕人员已达30多人。国民党特务为了“斩草除根”,到处布满了眼线和罗网,当袁咨桐再次出现在南京街头联络地下革命者时,藏在暗处的敌人已经把枪口对准了他……

袁咨桐再次被捕。国民党特务用尽毒刑,企图软化这位少年革命者。然而袁咨桐铁心不悔,在法庭上与敌人激

烈争辩,惹得大刽子手、国民党南京公安局局长谷正伦恼羞成怒,于是大笔一挥:“不释,枪决!”

袁咨桐的义父黄齐生得知后火速赶到南京,直接找到谷正伦(谷的老婆也是黄齐生的学生),说:“请看在都是贵州老乡的面上手下留情。这孩子尚年幼,其有爱国之心,实为可贵。虽有冲动之处,但也不致死罪吧?”

谷正伦知道黄齐生的威望,便说:“那就让他写个悔过书,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这样可保他一命。”

谷正伦亲自拿着“悔过书”去让袁咨桐签字,并对他说:“你小小年纪,别太任性。抓你进来,就是因为你足够判死罪。知道人死不能复生吗?”

袁咨桐将头一扭,回答道:“我虽年纪小,但懂得做人的道理。有的人活着,跟狗一样。有的人虽死犹荣,我们革命者就是这样的人。”

“活见鬼!”谷正伦气得扭头就走。回到办公室,他就把判决书上袁咨桐的年龄由“16岁”改成了“18岁”。

“亲爱的二哥……我们各有着不同的处境,有人忍辱顺受,有人在观望徘徊,有人勇往直前。一个人到了不怕死的地步,还有什么顾忌呢?有了这种舍己为公的奋斗精神,还怕理想事业不能成功吗?”

残忍的敌人并没有因为袁咨桐等青春年少而放过他们,“晓庄十烈士”在1930年的八九月间被国民党先后枪杀于雨花台。他们中年龄最小的是袁咨桐,还有一位也只有17虚岁,反动派采取了与对待袁咨桐同样的办法——“改年龄”以判其死刑。

让我们一起记住这十位年轻的革命烈士(他们中4人是共产党员,其余为青年团员):袁咨桐(16岁)、沈云楼(17岁)、姚爱兰(女,18岁)、郭凤韶(女,19岁)、谢伟棠(20岁)、叶刚(22岁)、汤藻(22岁)、马名驹(22岁)、胡尚志(23岁)、石俊(23岁)。

一个年轻生命在斗争的征途上倒下之后,激愤了无数仍在战斗的革命志士!当时,鲁迅的学生、著名作家柔石闻讯后,悲愤地写下了一首题为《血在沸》的长诗(节选)——

血在沸/心在烧/在这恐怖的夜里/他死了!

他死了/在这白色恐怖的夜里/我们的小同志/枪杀的/子弹丢进他的胸膛/鲜血了/小小的身子/草地上/流着一片鲜红/血……血在沸/心在烧/地球在震动/火山在爆发……

我们知道,柔石写下这首革命诗篇没几个月,他也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时年29岁。在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的岁月里,无数革命者付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的青春如火炬照亮了世界,照亮了美好的明天!

##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越野车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飞驰。雪山积玉堆琼,巍峨奇美,如一条银色巨龙腾云驾雾,在湛蓝的天空映衬下,闪烁着灿烂的银光。一路上听当地战友讲述高原军人的戎边故事,我心中热血沸腾。眺望远山,昔日鼓角铮鸣的恢宏与壮烈并未退却,烈士英灵似乎仍在云雾缭绕的峡谷中低吟徘徊。

此行是带领摄制组前往西藏山南地区拍摄纪录片《军人的荣耀》。出发前,我请示厂长、政委同意,带着一面“八一”电影制片厂战地摄影队“旗帜”同行。

途经斗玉乡,道路险峻,尘土飞扬,一路颠簸。工人们正在修理国道,作业条件十分艰苦。我乘坐的勇士越野车喇叭坏了,碰巧悬崖间有一辆施工车倒车,没看见我们的车,司机急按喇叭却怎么也按不响。好在施工车急停,要不然我们会被这大家伙拱下悬崖,好惊险!行至11时,路经西藏军区原司令员张贵荣烈士纪念碑,将军在1984年检查边防工作时牺牲。我们停车集体祭拜烈士,点燃三支烟敬香,脱帽三鞠躬。

12时进入陵村。营区依江东西向而建,两厢高山挺拔,山顶白雪皑皑,山风呼啸而过,格外阴冷。连队官兵定期巡逻,刀背山,一线天,断崖谷等都是险峻的必巡之路。一代代边防军人用双脚丈量国家的领土,践行着“老祖宗留下来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的铮铮誓言。这里没有界碑,也没有边境警示牌,但有的是边关军人铿锵有力的脚步,有的是边关军人“特别讲政治、特别守纪律、特别能奉献”的忠勇担当。先进典型余刚营长、“巡逻王”杨祥国等英雄均出自此部,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战斗的英雄部队。

某部营区,气温零摄氏度,下雨。11时雨停。摄影队拍摄员、四级军士长赵亚军和战友巡逻过铁桥。我与赵亚军很快就熟悉了,这个陕西咸阳籍的小伙子今年已是第16年兵,军改前一直在山南军分区生产团服役,去年调入这个连队。他入伍16年,虽艰苦努力,但由于立功指标少,从未立过功。谈及婚育情况,他面露愧疚,结婚多年,爱人一直未能怀孕。近期,他和爱人到西安原第四军医大学医院,开始办理试管婴儿的手续。我想起前一天教导员谈起驻藏官兵面对的困难,不仅是条件艰苦、精神寂寞,还有一个很大的苦楚是生育困难。官兵们不仅牺牲奉献着自己,还奉献了家庭和下一代。赵亚军今年面临退役,我看得出他对边疆、对连队、对战友感情很深。离队在即,他仍然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地巡逻在边境线上,所以我们选择赵亚军作为纪录片《军人的荣耀》的主要人物之一。

拍摄等待中,我转到了某连炊事班。一名战士正在压面条,他说战士们最爱吃鸡蛋压面条。还有几个小伙子正在炒菜。连队给养每十天从山南送来一次,最缺的是蔬菜水果。今天蔬菜所剩无几,只有一点大葱,我拿起铲子给大伙炒了个大葱炒鸡蛋。还有两个罐头菜,一个是竹笋,一个是午餐肉。高原官兵

# 山南边关行

■桂玉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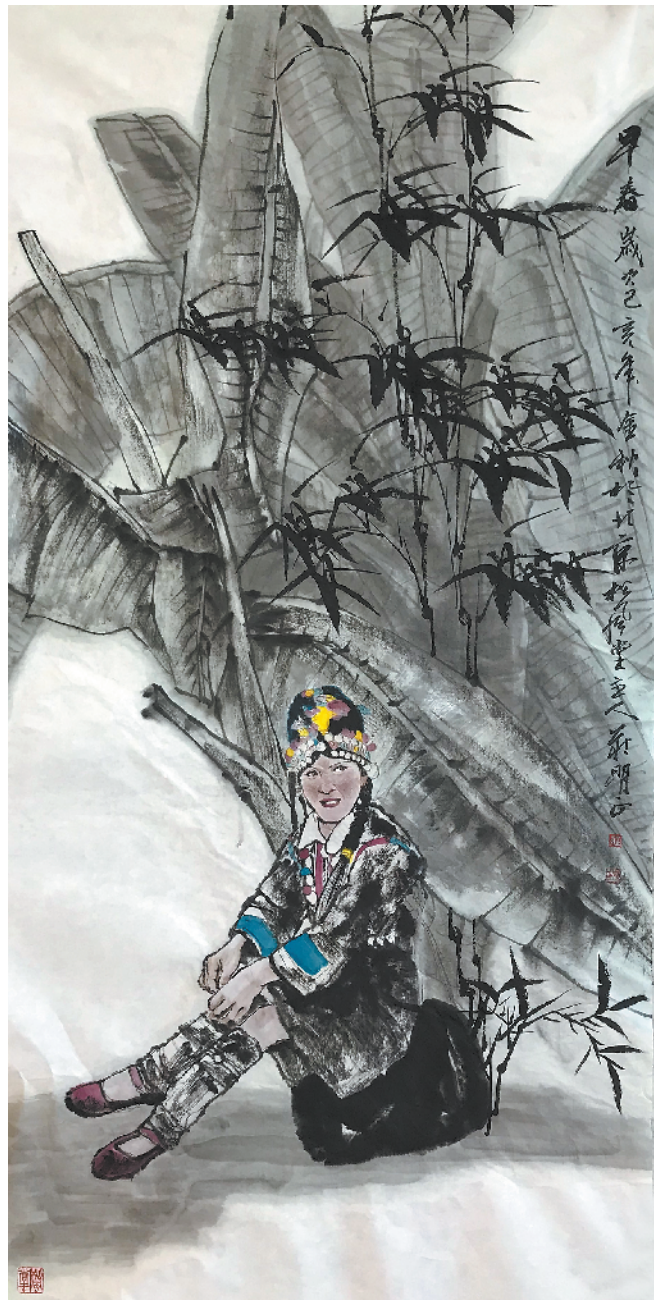
兵的生活仍旧艰苦,但我没有听到一个人叫苦,他们总是积极乐观地面对。

万里晴空,雪山银白,山色青黄,甲曲江水湍急地向东奔流。早上随部队进山巡逻,拍摄队全体人员出动,跟随拍摄过一线天、蹬山间瀑布和巡逻归营。官兵们在接近零摄氏度的水中蹚行,没有人叫苦叫冷。摄影队的梁必欣、赵彦明、肖毅峰等也全程跟拍,吃苦和敬业精神令我感动。

第二天早上9时出发,我们前往位于无名湖方向的另一个部队。该部驻守高海拔地区,常年缺水、缺电、缺菜。由于条件恶劣,家属来队探亲也很不方便。有一年,一位军人家属来队探亲,正逢大雪封山,两米厚的积雪挡住了去无名湖的路。眼看假期所余无几,团长看到他们夫妻俩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心急如焚,下令推雪开路,成全了这对牛郎织女的相会。雪路打通那一刻,一对年轻的恋人在无名湖畔相拥而泣,雪山冰湖见证了那感动天地的一幕。

就在我们来团前的十多天前,该部又发生了一出悲剧:一名士官妻子因思念丈夫心切,匆匆匆匆来山南探望驻守连队的丈夫。出发前已经思上感冒,她没太在意,从内地马不停蹄赶上高原,晚上住在连队。结果,第二天清晨,任她那在高原值守的兵哥哥怎么呼唤,这位年轻的军嫂却再也沒有睁开眼,可怜她不满一岁的孩子永远失去了妈妈……

一路行走高原,我和高原军人的心靠近、靠近,再靠近。在朝夕相处中,我一次次被边防军人的伟大奉献、伟大情感感动得流下热泪。那些天,我常常凝视着巍巍雪山,想起刘伯承元帅曾对驻藏部队发出的感叹,能在那里驻扎下去的是一群灵与肉铸成的钢筋水泥!是啊,在我心中,边防军人就是雪山一样的存在,永远巍峨高洁,永远值得我仰望!



边地 (中国画)

庄正作

## 长征

第四七二期

##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山势巍峨,云雾缭绕,民风淳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首关于烈士孙占元的歌谣传唱在英雄的故乡河南林州,让孙占元这个名字家喻户晓。朴实的歌谣传唱了60多年,当年的三弓水村如今已改名为占元村。

出生于太行山南麓林州市临淇镇三弓水村的烈士孙占元,与黄继光、邱少云齐名,是在上甘岭战役中壮烈牺牲的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走进县城烈士陵园的孙占元纪念馆,这里陈列着数位领导人的题词、烈士生前使用过的物品,还有朝鲜赠送给孙占元烈士家属的7件纪念品,我却始终没有找到英雄的照片。馆内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孙占元烈士生前没有照片,馆内只有一张烈士的画像。孙占元的连长张计发曾经趴在孙占元的墓碑前放声大哭:1949年,他和孙占元参加解放贵州的战役时,张计发当排长,孙占元当班长。有一次,两人想合张影却没有钱,这成了连长张计发一辈子的遗憾。而纪念馆仅有的那幅画像据说还是当地一位美术老师,根据孙占元亲友的回忆描绘,最后经过孙占元妹妹确定完成的。定格在画纸上的孙占元21岁左右,这也是他留在世人心中最后的印象。

2015年清明节,孙占元的妹妹孙立兰老人前来拜祭自己的哥哥。在纪念馆前,孙立兰望着哥哥的雕像泣不成声,回忆起了少年时代那段坎坷的岁月:父母早逝,家境贫寒。1943年,日寇横行,干旱蝗灾,他们兄妹二人与堂哥等人结伴逃荒到江苏徐州。孙立兰留在了徐州,孙占元则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家乡参加了解放军。这一别,兄妹再也没有相见。

# 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魏俊彦 原野

抚摸着孙占元的雕像,烈士牺牲的那一幕幕场景随着讲解员的讲述仿佛在我们眼前展现……

1952年10月14日凌晨,上甘岭上空响起炮火的轰炸声,夺回二号阵地的任务交给了志愿军一三五团二连排长孙占元手上。透过缭绕的黑烟,孙占元发现,敌方的四个火力点构成了一个梯形火力网,死死地封锁着反击的道路,形势不容乐观。

远方的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增援的第二梯队被敌密集的炮火挡住了。这意味着二排将要单独完成攻克二号阵地的任务。此时,一颗炸弹突然在孙占元身边炸开,巨大的冲击力将他卷到了一个弹坑里,昏了过去……等他醒过来,一阵剧烈的疼痛袭来,他发现自己的右膝露着骨头,只有一层皮连着;左腿肌肉被削去一半,骨头外露,鲜血直流。

“排长,你的腿!”战士易才学的目光落在了孙占元血淋淋的腿脚,他一边慌张地拿出急救包包包,一边抽泣着劝孙占元回后方。“擦破……点皮,没什么。现在的形势很严峻,三排没有上来,咱们排伤亡很大。但是,我们就是剩一个人……也要把二号阵地……拿下来……”孙占元断断续续安排着任务,大滴的汗珠簌簌往下落。

在孙占元的指挥下,易才学接近第二个火力点。孙占元扣动扳机压制掩护,易才学则迅速拿出一颗手雷,向第二个火力点狠狠地掷去,随即滚到第三个火力点附近,将一个爆破筒也塞进了暗洞。随着两

声爆炸,敌人的两个火力发射点被炸毁。

山下的敌人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地爬了上来。孙占元端起两挺缴获的美式机枪交替猛射,在排长的掩护下,易才学也转到敌火力点侧后,拉起手雷掷向高地上最后一个敌堡,最后一个火力点也成了“哑巴”。

这时,敌人的新一轮进攻开始了,眼看最前边的敌人要把阵地包围了。千钧一发之际,孙占元抱起一捆手榴弹,拉开导火线,奋力从阵地上滚向敌群。“轰隆隆!”几声巨响,火光四射中,孙占元与敌人同归于尽。

孙占元牺牲后,二排战士和接应上来的第二、三梯队志愿军官兵一齐发出怒吼:“为孙排长报仇!”怀着对敌人刻骨的仇恨,官兵们向敌军发起了势不可挡的进攻。鲜艳的红旗,猎猎飘扬在了五圣山上。

1953年2月26日,孙占元、黄继光、邱少云三位英雄的灵柩从朝鲜运到了沈阳中心广场的烈士灵堂。3月6日,沈阳各界代表数万人为三位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几十万群众默默肃立,迎接烈士英灵。

1955年5月14日,秦基伟将军亲自为孙占元撰写了碑文。他曾经多次深情地说:“我永远忘不了那些献身于上甘岭的英雄们,他们的身影时常浮现在我眼前。”

在孙占元纪念馆前,易新黔一家三口长跪不起,而后将一双崭新的皮鞋摆在了孙占元的塑像前。问及原因,易才学的儿子易新黔动情地说:“我父亲在世

的时候告诉我,当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时,谈起战争后的打算,孙伯伯曾说过,将来要能穿上一双皮鞋,站到天安门前照一张相,回家再娶个媳妇,就心满意足了。我们来,就是替孙伯伯了却这样一桩心愿。”

随后,他们一家三口来到孙占元的故居,将易才学老人坟头的一抔黄土撒在了孙占元住过的院子里。“孙伯伯,这是我家坟头的黄土,我带来了两杯,一抔土撒在您的故居,另一抔土撒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您的墓前。孙伯伯,我父亲在世的时候经常念叨您,您二位老人在天有灵,今天可以相见了。”易新黔两眼湿润,久久不能平静。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山风拂过,离占元村不远的山路上传来了嘹亮的歌声。漫山遍野盛开的杜鹃花如火焰般燃烧,伴着那深情悠远的歌声,有一种永恒的精神在山间流传……

